

春秋郢都无城说

尹弘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 湖北武汉, 430077)

[摘要] 楚郢都故址所在, 至今尚未解决, 被学界认为有可能为楚郢都故址的江陵纪南城、当阳季家湖古城和宜城楚皇城, 作为春秋早期楚始都之郢的可能性都不大。春秋郢都故址至今未能找到, 应是被“城”所蔽。结合文献分析及考古实证, 可知春秋郢都并没有城, 没有城垣遗迹, 只是一个大遗址。

[关键词] 春秋 楚国 郢都 城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 (2010) 03-0077-07

[收稿日期] 2009-09-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05JJDZH244)。

[作者简介] 尹弘兵 (1967-), 男, 湖北天门人,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楚国历史地理与文化。

郢都是楚国历时最久的都城, 自春秋早期楚武王徙郢^①, 到战国晚期秦将白起拔郢止, 楚国以郢为都长达 400 余年, 占楚国历史的一半左右。但楚郢都故址所在, 却始终未能解决。本文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重新整理相关文献记载, 结合文物考古部门多年来在鄂西地区的楚郢都探索, 对目前争议较大的、春秋时期的楚郢都作一些新的讨论, 希望这些工作能对楚郢都探索这一长期的学术疑难问题有所助益。

一 鄂西地区的楚郢都探索

楚郢都的年代, 已是东周时期, 此时社会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文献资料也比西周时期大为丰富, 因此楚郢都探索, 首先是从文献资料的分析中确定其地望, 然后实地寻找相应的故址。目前, 学界虽对郢都地望有较大的争议, 但楚东迁之前, 郢都所在大抵不出今鄂西地区的蛮河流域和沮漳河流域二地, 均在汉水以西、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这一共识是我们探索郢都的基础。在这一区域内, 被学者认为有可能是楚郢都

故址的, 共有三处: 江陵纪南城、宜城楚皇城、当阳季家湖古城。

首先是江陵纪南城。自唐代初年的《括地志》以来^②, 学者多认为楚郢都即江陵县北五公里处的纪南城遗址。原江陵县今已改名为荆州区, 江陵县则东徙至赫穴镇, 但传统上仍习称江陵纪南城。纪南城周长达 15.5 公里, 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 东西长 4450 米, 南北宽 3588

①楚都迁郢的具体时间有文王、武王二说, 传统说法一般据《史记》之《楚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地理志》认为文王始都郢, 另一说则据《世本·居篇》和杜预《春秋释例·氏族谱》认为楚武王时已徙郢, 自清代以来, 宋翔凤、董书业等学者均主武王说, 近年石泉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比较研究, 认为楚武王晚年迁郢当更可凭信。参阅石泉:《楚都何时迁郢》,《江汉论坛》, 1984 年第 4 期, 第 76-78 页;《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第 352-353 页。

②《史记》卷 40《楚世家》,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杜预云国都于郢, 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

米，面积近 16 平方公里。已知城门七处，其中两处水门，已发掘的两个城门都有三个门道，城垣上有烽火台，城垣四周有宽 40—100 米的护城河，城内已探明 84 座台基，有的具有宫殿基址规模，还发现有制陶、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及 400 余口水井，说明当时居民密集的状况^①。纪南城是目前楚地范围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城址，比现存的荆州砖城还要大。城外发现有大量东周时期的遗址和墓地，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多分布在城北的纪山和城西的八岭山等地，大型贵族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宛如小山；平民墓地的特点是墓葬极为密集，数量庞大，每处墓地的墓葬数量可达数万，已发掘的著名楚墓有雨台山墓地、九店墓地等。上世纪七十年代，文物考古部门曾在纪南城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学界当时得出明确的结论，“根据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纪南城就是楚之郢都”。至于是否为楚文王始都之郢，“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②。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纪南城的年代，无法上溯至春秋早期，这与楚武王或文王始都郢的年代明显不合。1982 年发掘报告推断，作为城址，纪南城始建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遗址部分，城内的遗存可早至春秋晚期，部分遗物有可能早至春秋中期。这一年代可以用城外的楚墓年代来印证。纪南城附近的楚墓发掘数量已十分惊人，但春秋早中期只有零星的小型墓，无中型以上的墓葬，春秋晚期以后，楚墓的数量增多，到战国时期数量大增。从目前已发表的两处大型墓地报告来看，江陵雨台山墓地，1984 年报告有 558 座楚墓，其中能分期的 423 座，这 423 座墓中，春秋中期以前的仅 9 座，春秋晚期的 65 座，战国早期的 115 座，余为战国中期以后的^③。九店墓地，1995 年报告了 597 座墓葬，可参加分期的 481 座墓，其中西周晚期墓 1 座，春秋墓总共 19 座，战国早期墓 19 座，战国中期早段墓 47 座，战国中期晚段墓急剧增加到 203 座，战国晚期早段（白起拔郢以前）墓 158 座，战国晚期晚段（白起拔郢以后）墓剧减至 34 座^④。由此可见，纪南城一带在春秋早中期，人烟稀少，春秋晚期时明显增加，到战国时期急剧增加，其最繁荣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公元前 278 年秦将

白起拔郢以后纪南城一带人口急剧减少，同时城内的凤凰山一带出现秦汉墓地，表明战国晚期晚段时纪南城已被废弃。城内则有三处墓地，西部的陕家湾、东岳庙为春秋中晚期墓地^⑤，南部的凤凰山则是著名的秦汉墓地。总之，结合纪南城内外考古发掘资料来看，目前纪南城遗址的年代还不能上溯至春秋早期，到春秋中期时，纪南城一带也只是一处规模很小的聚落，春秋晚期以后开始筑城，此后城内便不再作为墓地使用，至白起拔郢、楚国东迁以后，纪南城被废弃，城内又重新作为墓地使用。由此可见，纪南城虽然是楚郢都，但只能是战国时期的楚郢都，即秦将白起所拔之郢，不可能是春秋早期楚武王或文王始都之郢。而且纪南城的地理位置与《左传》所记春秋时期的楚国形势明显不合，现在学界已基本认可纪南城不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⑥。

纪南城既然不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于是学者的目光开始向沮漳河上游地区和更北的襄宜平原探求。童书业先生早年依据《左传》的资料，仔细研究了春秋时期的楚人活动范围、行军路线及与周边国家的方位、距离等，发现“春秋初年楚所都之郢，似不得远至今之江陵”。如在江陵，就与《左传》所记的地理及楚国在春秋时的发展形势不符，其时楚国极力向北发展，则郢都自应偏北，主张“春秋时楚之郢都应在汉水中游一带”，具体地区为“淅川之南、宜城之北、荆山

①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 年第 3、4 期，第 325—349、477—506 页。

②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 年第 4 期，第 504—505 页。

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135—139 页。

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4—27、405—414 页。

⑤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 年第 4 期，第 477—506 页。

⑥对于纪南城的性质，《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仅确定纪南城为战国时期的郢都，无法上溯至春秋时期。近年学者亦多认为纪南城非春秋郢都，参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81 页；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34—39 页；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06 年第 8 期，第 63—68 页。

之东、汉水之西，今湖北省西北部”^①。石泉先生则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仔细考定吴师入郢的行军路线、相关战地的地望、楚昭王君臣奔随路线、以及秦师救楚、吴人东归所至之处等等，发现此次吴师入郢所涉及的地区，基本上都在南阳盆地、汉水中游及随枣走廊，战场也集中于襄樊一带的汉水北岸及南阳盆地东南部的唐河、新野、泌阳县境，全部史事中的二三十个地名，经重新考释之后，皆在江汉平原以北的河谷平原、丘陵、盆地中，绝无位于长江边上者^②。此后，石泉先生又对郢都附近的水系、相关地名的地望和移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结合考古材料，提出楚始都之郢为今宜城楚皇城遗址^③。

楚皇城遗址位在宜城市东南7.5公里处，距汉水6公里，城垣周长6440米，有8个城门，面积2.2平方公里^④，近年来，为配合宜城市政府制定楚皇城遗址的保护方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了一些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城址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外城平面呈不规则形，城址南北长1840米，东西宽1720米，城垣底宽24—30米，高2—4米，城内地层有屈家岭文化、春秋中期、春秋战国之际、战国中晚期、西汉和东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外城墙底部叠压有春秋中晚期的地层和灰坑，主体城墙始筑于战国时期，西汉时增修的城墙叠压其上，东汉时期又加筑了内外护坡。内城位于外城内的东北隅台地之上，南北长800米，东西宽480米，面积约0.38平方公里，内城的东南、西部皆有夯筑城垣，城垣宽22米，其北部及东北部借用了外城的城墙，可初步断定其内城与外城为统一规划修建。遗址内曾出土春秋早期的铜方壶，高达53厘米，重达13千克，器表满饰窃曲纹，应为高级贵族所用的重器，城内还出有“郢爰”（郢铢）等重要文物。楚皇城遗址面积较大，遗物丰富，是一处重要的东周城址，但其始建年代也与楚人始都郢的年代不合，因此目前要断定其为春秋时期的楚郢都，似乎证据不足^⑤。遗址部分就现有资料来看也只能上溯至春秋中期，也与楚武王或文王的年代不合。

在沮漳河中游还有当阳季家湖古城，方位在沮漳河西岸、当阳东南与枝江交界处，东距沮漳河约3公里，城址东西宽约1400米，南北长约

2000米，面积约28平方公里，1979年曾作试掘，发现有城墙、城濠、宫殿台基等建筑遗迹，城址为东周时期，年代早于江陵纪南城。城内的堆积，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上层为东周遗存，年代最早到春秋中期。城内的1号建筑台基出有宫殿建筑上的青铜构件和著名的“秦王卑命钟”^⑥。此城早年曾一度被认为是楚丹阳所在，但由于季家湖古城的年代只及东周，其为丹阳的可能性不大，但季家湖古城在年代上可与江陵纪南城相衔接，地理上也较为邻近，故有学者认为此城应为春秋中晚期的郢都^⑦，或整个春秋时期的楚郢都^⑧。不过此城并无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遗存，文献上也缺乏依据，地理上难以与楚国在春秋早期的活动相匹配，故此说流行不广，其为春秋早期楚武王始都之郢的可能性也不大。

二 对春秋郢都探索的反思

在鄂西地区寻找楚郢都故址是楚文化考古的一项重要工作，但考古学界在楚郢都探索上重点关注的三个东周楚城——江陵纪南城、当阳季家湖古城和宜城楚皇城，现在看来，作为春秋早期楚武王或文王始都之郢的可能性都不大，在鄂西地区寻找春秋郢都故址的努力，迄今为止并未取得相应的成果。对比其它东周诸侯国都城考古的

①童书业：《春秋楚郢都辨疑》，《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第96—97页。

②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5—402页。

③石泉：《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第54—61页；《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7—481页。

④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第108—113页。

⑤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06年第8期，第63—68页。

⑥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文物》，1980年第10期，第31—39页。

⑦郭德维：《楚郢都辨疑》，《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第38—48页；《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4—37页。

⑧高应勳：《春秋楚郢与季家湖古城》，《华中建筑》，1992年第1期，第56—57页。

成果，这种情形实在值得我们反思。

湖北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除了难以数计的考古发掘外，全国性的大型文物普查也已进行了二次，其成果已汇编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中，目前正在展开第三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虽然不能说，我们已尽知地下文物的分布情况，但就鄂西地区而言，至少在荆州、当阳、宜城这些被高度关注的重点地区，春秋郢都故址这样的特大型遗址或城址要想逃脱考古工作者的法眼、深埋于地下而不为人知，是很难想象的。人工破坏不可能把一座大型都城变得无影无踪，以战国郢都为例，这座都城虽然被白起彻底毁灭，但其故址至今巍峨耸立。再就是自然地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春秋郢都故址被彻底湮灭，但这样的可能性恐怕也不存在。在文物考古资料已累积到今天的情况下，要在鄂西地区找到新的、未被发现的春秋城址，看来是相当困难的事，希望渺茫。春秋楚郢都探索这一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疑难问题，似乎已走入了死胡同，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对此情形，我们不得不反思，在以往的楚都探索上，我们是否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笔者认为，象春秋郢都这样的大遗址或大城址，不可能深埋于地下而不被我们发现，它应该是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只是我们被某种习惯性的误区遮蔽了双眼以至于对它视而不见。

这个误区就是“城”。春秋郢都是否有城，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曰春秋郢都无城，主要的依据是《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明记“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楚大夫沈尹戌评论说：“无亦监乎若敖、蚘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可见楚郢都直至春秋晚期才开始筑城。另一说则谓春秋郢都有城，主要的依据是鲁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楚文王御巴师，“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鬻拳其人，据后文所记，为楚大阍，杜预注：“若今城门校尉官。”既有城门官，则郢都自当有城。

但检索考古资料，湖北西部，至今未发现春秋早期的楚城，整个湖北地区，春秋时期的楚城也很少，大多数为战国楚城^①。从早期文明研究的成果来看，早期文明筑城一般是在共同体的边

缘区，为防范其他族群对自己领土的侵犯、掠夺，故筑起城垒以守土卫族^②，而文化中心区的大型聚落因不必担心异族入侵，反而无需建筑城墙^③。所以，从“城”的起源来看，筑城是因有防御上的需要，早期文明时，有这种防御需要的一般是边缘地区，而“都”一般位于核心区，没有防御上的要求，也就没有筑城的必要，因此早期文明的“都”很多是没有城的，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以及西周的沔、镐，以上已知的三代都邑，其位在核心区者，均无城垣，除殷墟的大濠沟可能具有防御作用外，其他遗址连这样次一级的防御设施也没有。而偃师商城为商人灭夏后在夏核心区所建，为统治夏民，故筑城以镇之。可见，城是有需要、有原因才建的，不是无缘无故就会筑城的。在较早的历史时期，位在核心区的“都”因无防御上的要求，一般是不需要筑城的，反而是边缘区，因有防御上的需要与必要，才会筑城。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楚囊瓦城郢，是因为当时郢都面临来自吴国的军事威胁，有此实际的需要，才有囊瓦城郢之事。所以“都”不一定有“城”，至少“都”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城”的。至于曲阜鲁故城等城址，那是因为鲁国这类国家建于征服区，一开始就面临着当地民族的反抗，带有武装殖民、军事占领的性质，故建国伊始就有“都城”。而当“都”位于核心区，没有防御上的实际需要与必要时，给“都”筑城就是一件不必要的事。沈尹戌明确地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④沈尹戌在这里明白地说“国焉用城？”可见当时人的普遍观点，当“都”位于核心区，没有防御上的要求，或者说

①陈振裕：《东周楚城初探》，《奋发荆楚探索文明》，（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44-158页。

②曹兵武：《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2-29页。

③赵春青：《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史前城址的比较》，《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第57页。

④《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没有防御上的实际需要与必要时，“都”是不用、也不应筑城的，筑城的地方应在边境，所谓“守在四夷”。“都”与“城”相结合变成“都城”是相当晚的事，春秋晚期以后，随着兼并战争越来越激烈，“亡国破家相随属”^①，虽大国强国，其“都”亦不能免于战火，吴师千里袭郢，即是明证。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核心区普遍筑城是春秋晚期以后战争越来越激烈的结果。当战争的进步使得核心区及位在核心区的“都”也变得不安全、也面临战争的威胁时，古人才有给“都”筑城的动力，才会在核心区普遍筑城，于是“都”开始普遍与“城”相结合变成“都城”。“都”一定有“城”乃至变成最大、最坚固的城，是军事技术进步与战争形态发展对“都”构成威胁，使得“都”必须要考虑防御的产物。但直到西汉初期，汉长安最初也是没有城的，只有几座宫殿，“汉高帝时，先把秦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使用，接着又在长乐宫以西建筑未央宫，在未央宫以北草创北宫，又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建武库。直到汉惠帝时，才筑周围的城墙，建设西市”^②。此后，才有立都必建城、无城不成都、都与城密不可分概念，但这是“都”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早期的“都”并不一定是有“城”的，不能以后世的“都城”概念来看待早期的“都”。

三 郢都有城的文献资料辨析

至于《左传》所记楚文王与鬻拳之事，我们认为有门并不意味着有城，“门”未可径释为“城门”。鬻拳确为大阍，但所守之门可能并非城门，而是宫门。张正明《楚史》即主张鬻拳所守之门为宫门，所葬之经黄在宫门内^③。当时的楚郢都可能没有城，但一定有宫殿，宫殿一定有宫门，鬻拳所典守之门，或为宫门。《左传》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记楚文王被鬻拳拒于门外后，以败师伐黄，“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於经皇”。杜预注：“经黄，冢前阙，生守门，故死不失职。”今按，杜预此释当有误，唐孔颖达《正义》云：“宣十四年传称楚子闻宋杀申丹，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剑及於寝门之外。则室皇

近於门外，当是寝门阙也。”由此看来，经皇即是寝门阙，非如杜预释为冢前阙。阙，可指城门或宫门两侧的高台，中有道路，《说文·门部》：“阙，门观也。”徐锴《系传》：“盖为二台于门外，人君作楼观於上，上員下方。以其阙然为道谓之阙，以其上可远观谓之观，以其县法谓之象魏。”《三辅黄图·杂录》：“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何清谷注引陈直曰：“《古今注》卷上云：‘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至此，则思其所阙。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④《六书故·工事一》：“宫城上为楼观，阙其下为门，所谓阙门也。”^⑤可知楚人所谓经黄，当即宫门或宫门附近。杨伯峻亦认为“经黄即宣十四年《传》‘履及於室黄’之经黄。室、经字通，盖殿前之庭也。楚文王陵墓，必有地下宫殿，鬻拳之尸即葬於殿前之庭，所以示愿侍君於地下为守卫也。杜注解经黄为冢前阙，不知冢前不得有阙，即冢前之门亦不能葬人”^⑥。则鬻拳所葬之经黄，当在其生前典守之宫门附近，示死不失职。由此可见鬻拳所守之门，只能是宫门而非城门。

又《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载：“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闾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巴人“门于楚”，杜预注：“攻楚城门。”后人往往以为此段文字所记，当是巴人攻到楚都城门下，由此而论，则楚文王时郢都当已筑城。今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85页。

②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③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④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70-371页。

⑤[宋]戴侗：《六书故》，（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620页。

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211页。

按，杜预释“门”为城门当有误，庄公十八年、十九年传文所记为同一事件，只是跨了两个年头，被分记于庄公十八、十九两年（公元前676、公元前675年）。细绎此事，“门于楚”非指巴人攻到郢都城门之意。如释“门”为城门，则庄公十八年巴人攻下那处后即直达郢都城下。那处所在，据杜预注：“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汉晋编县，据唐宋时人的记载，皆云在长林县，唐宋长林县地望，后人解释不一，小有异同，但皆云在今钟祥、荆门之间^①。如释门为城门，则巴人攻占那处后即直达郢都城下，这在地理上难以讲通。再从军事形势上看，如按杜预注释“门于楚”为“攻楚城门”，则楚巴战争当立即在郢都城下展开，但事实却是直到发生了阎敖之族叛乱以后，才有巴人伐楚之事，此时已到庄公十九年春，足见所谓“门于楚”，非指巴人攻到楚郢都城门之意。而且，据此分析，在阎敖之族叛乱以前，巴人一直在那处，并没有攻到郢都城下，直到阎敖之族叛乱发生后，巴人才开始攻楚。次年（鲁庄公十九年）春，巴楚战争才正式爆发，巴楚之战的地点也不在郢都城下，而是在津。津地所在，杜预认为即江陵之津乡，杜预之说，则本自应劭：“南郡江陵有津乡。”另枝江亦有津乡，在枝江县西三里，酈道元、郭仲产认为即楚文王所败之津^②。是诸家皆以为津与津乡为一地，而津乡之地，或在江陵、或在枝江。然此说或有可议之处，津，本义是指渡口，《说文·水部》：“津，水渡也。”《尚书·禹贡》：“又东至于孟津。”唐孔颖达疏：“孟是地名，津是渡处，在孟地致津，谓之‘孟津’。”《论语》卷18《微子》：“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水经注》卷5《河水五》：“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可见凡水渡皆可谓之津，似未可据以径指后世之津乡，应、杜、酈、郭之说或有误。从《左传》所记来看，津地当在那处与郢都之间，可能是其间的一处较大的渡口。此战楚军大败之后，巴人未能直入楚腹地，当是楚军依河而守，凭水阻敌。因此巴人距郢都尚远，而且此战楚文王大败而还后，还能以败师伐黄，毫不顾及巴人对郢都的威胁，这表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郢都并未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凡此皆足证所谓“门于楚”，非指巴人攻楚都城门，而是

指巴人占那处后形成了攻楚之势，对楚国核心区构成了威胁。如此，则“门于楚”之门，非指城门，而是象征性地指国之门户，意指捍卫国境的重要城池、山川、关隘，具体说就是那处。

释“门于楚”之“门”为“国门”，在文献上亦有确切的证据。《左传》文公三年（公元前624年）：“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方城并不是一座城池，并无城门，但方城作为楚国的国防重地，向来被楚人视为国之门户，《左传》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载楚屈完答齐桓公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可见春秋时代，楚人已视山川、城池为国之门户，故知“门于楚”只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未可据以实指楚郢都之城门。

结 语

综合文献分析及考古实证，可知沈尹戌之言当是事实，春秋时楚郢都并无城垣。由此可知，春秋郢都故址就只是一个大遗址，并不是城址，故东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就有可能为春秋郢都，不一定非要从城址的角度来探求。试图从“城”来寻找春秋郢都故址，实乃误区，这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找不到春秋郢都故址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楚都探索的问题上，要突破城垣对我们的束缚。长期以来，在探索楚郢都故址时，学界只把目光集中在纪南城、季家湖古城、楚皇城等几个东周城址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都城一定有城墙，郢都也一定是有城墙的，这种习惯性的误区导致我们对春秋郢都视而不见。由此而论，丹阳和春秋郢都很可能只是一个大型的聚落，没有城墙或只有象征性的城墙以及栅栏、濠沟等设施，但一定有宫殿、有

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荆门州“长林废县”及“编县城”二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52，湖北省荆门直隶州古迹，“编县故城”及“长林故城”条。

②[北魏]酈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2《江水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54页。

道路、有高等级的遗物，反映在考古学上，就只是一个大遗址，而不是城址。即使是城址，也要立足于遗址的角度来探讨，因为城垣完全可能是后来才修的，要以遗址的年代来作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不能以城垣遗迹及其年代作为主要的依据。因此，我们应把目光从城址转到遗址，不拘

泥于城址来探讨早期楚都所在，只要在考定的楚都所在区域内找到大型的东周聚落群，在此聚落群中找到了中心聚落、并且此聚落遗址内有宫殿、道路、有高等级的遗存与遗物，就有可能是春秋郢都故址，不一定非有城垣不可。

Analysis on the View that Capital Ying Held No City Walls during Spring-and-Autumn Period

Yin Hongbing

(*Institute of Chu Culture Studies of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Wuhan, 430077*)

Abstract: Where is site of Capital Ying remains a myster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Capital Ying of Chu State, when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may not in Ancient Jinan City of Jiangling, Ancient Jijiahu City of Dangyang or Ancient Chuhuancheng Site of Yicheng, although all of which are considered having possibilities as the site of Capital Ying by academe. The reason why Capital Ying has not been found yet, should due to the view that a capital must have city walls. On the basis of analys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apital Ying was a large settlement site, holding no city walls during that time.

Key words: Spring-and-Autumn Period; Chu State; Capital Ying; City walls

* * * * *

(上接 76 页)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Border History of Mr. Feng Jiasheng

Zhang Yongshuai¹ Zhang Wei²

(1.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Abstract: Mr. Feng Jiasheng had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linguistics, ethnic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o on. And the study on frontier history and geography was in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brief review to this study. We think the further review and conclusion on the study of Mr. Feng Jiasheng is very necessary to building of the border science.

Key words: Mr. Feng Jiashe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northeast history; northwest history